引　言：经典及其解释

对研究古代中国思想的学者来说，经典及其解释的问题是一个需要时时面对的问题。毕竟，在从西汉到晚清的传统学问中，经学始终都居于大宗的地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学曾经发生过很多的改变，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形态，譬如经常被学者提到的汉学和宋学，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但无论如何，变化的只是各种解释，经典的地位是从没有动摇的。这正是经学的根底所在，因为所谓经学，简单说，就是经典之学，即解释和阐发经典内容和意义的学问。

经学地位的确立，学者一般都认为是以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这种确立，其实只是藉由外在的政治权威对经学价值和作用的一种承认。在这种承认的背后，表现出经学的发展已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到了一种较成熟的形态。达到这种较成熟形态的过程，如果从孔子开始算起，就有四百年左右。这四百年，对于经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个阶段，古老的经典透过儒者的不懈解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旧貌换了新颜。“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八个字，用在此时经典的上面，是再合适不过了。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在一般的经学史写作中，这个重要的过程经常被很简略地一带而过。

本书要讨论的《易传》，在经学中属于易学的范畴。它的地位应该说是相当特殊的。一方面，它本身就是经典的一部分，所谓《易经》十二篇（见《汉书．艺文志》关于“六艺略”的部分），是包括了它在内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对更古老的一部经典《周易》的解释。这种经传结合成为一部新经典的情形具有相当典型的象征和启示意义，也是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大雅·文王》）的最好诠释。它集中地表现了此时人们理解的经典形态和经典本身形态的漫长距离。可以说，《周易》和《易传》的距离有多大，这两种形态之间的距离就有多大。

尽管关于《易传》作者和成书年代的争论依然存在，而且目前还看不到取得共识的希望，但它出现于从孔子到汉武帝这四百年中，是没有问题的。作为解释《周易》的著作，《易传》在各种解释经典的作品中具有

很大的代表性。它的结构非常系统,保存非常完整,而且还有从马王堆到郭店的最新考古发现做参考。通过对《易传》如何解释《周易》的分析,可以为我们研究经典形态从旧到新的转变，研究此一阶段经学的形成过程,一句话,为研究经典及其解释的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而同时,对经典及其解释的一般情形有些了解,为《易传》的研究也会提供一个重要的背景。基于此种考虑,我们在研究《易传》之前,先对此时期经典及其解释的问题做一些一般性的描述。

一、六经的形成

经学即经典之学。在经学的整个历史过程中，经典的数目曾经发生过一些变化,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一经、十三经等不同的说法。但无论如何，六经作为最基本经典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过。

所谓“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文献。从汉代起，有时也称“六艺”。它们产生的年代不同,性质也不一样,而且原本也不是一个整体。《诗》本是民间歌诗和宗庙颂歌等的汇编,由“二南”、“十五国风”、“大小雅”和“颂”这几个部分组成，主要产生在西周时期。《书》则主要是一些政治性文件，由史官记载下来，分典、

谟、诰、誓等几种不同的体裁，以西周时期的文献为主。《礼》、《乐》记载周代的礼乐制度,这些制度据说是由周公制定的。《易》由大卜执掌，是占筮之书，供决疑之用。《春秋》则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由史官写成并掌管。这六部书中，《诗》、《书》、《礼》、《乐》较早地结合为一体。《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国的赵衰称赞别人的时候，说他“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将“诗书礼乐”并提的例子。而且，如果《礼记》提到的情况属实的话，当时的贵族教育，就已经拿“诗书礼乐”作为教本了。《王制篇》说：

>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这段话中，诗书礼乐被称为四术，四教。四教是说教学的四种课程，四术则是四方面的道术。果真如此，不仅诗书礼乐已经作为教本，而且，每一门课程都有自己的主题。其中讲的教学时间虽颇有些后世四时五行的气息，我们不必过分拘泥，但是内容大体是不错的。我们可以拿另一段更可靠的文字来证明。《国语·楚语》记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云：

>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

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孔子以后用诗书礼乐教授弟子，其实是沿袭了周代贵族教育的传统，不过一方面将教学对象扩展到民间，另一方面又为教科书注入了新的精神而已。

“六经”的形成，前人多以孔子为关键人物。《史记·孔子世家》说道：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夏殷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徼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视，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三百五篇，孔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 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 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这一段话,阐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非常详细。以此种说法,近人多有怀疑。不过从《论语》上看,《诗》、《书》、《礼》、《乐》和《周易》是都提到了。《春秋》虽没有涉及,但稍后的孟子却明确说是孔子所作,《滕文公》篇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并且记载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表明，孔子在“六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六经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在意义上有密切关系的整体,或者它们都具有相似的地位。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孔子最重视的还是春秋时期就用来教学的‘诗书礼乐’。司马迁说他以《诗》、《书》、《礼》、《乐》教,《论语》上经常讲的也是这四者,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以及‘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

言也”(《述而》)等。到孟子的时候,《春秋》才被抬到非常高的地位。但同时,孟子对《周易》是一字也不提的。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六经”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之中。《天运》篇中有一个老子和孔子的寓言,孔子在对话中说:

>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另外,《天下》篇中,也有如下的一段话:

>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这两段话,一处提到“六经”之名,一处阐发“六经”之大义,过去的学者多视它们为晚出的文字。但新近发现的郭店楚墓竹简中,[①] 有两篇与“六经”的问题有关。一篇是《六德》,其中有如下的文字:

> 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

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提,可知“六经”的系统已经形成。另一篇是《语丛二》,其中说道:

① 参见《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

《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书》……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①

这不仅提到了“六经”,还撮述了其大义,与《天下》篇有同有异。发现竹简的郭店楚墓被认为是下葬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当战国中期偏后。这不仅证明了《庄子》中有关“六经”内容的真实性,也说明“六经”系统至少在此时已经形成了。

二、为什么需要经典

经典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并不是不能质疑的。在战国时期,庄子就曾提出过这一问题。《天道》篇所记桓公与轮扁的故事中,古代的圣人之书被明确地表述为先王之糟粕,因为文字并不能记载和传递先王之道。《天运》篇借老子之口也明确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同时,法家对经典也表现出了特别的排斥。商鞅就以《诗》、《书》为“六虱”之一,要孝公去之,到了秦始皇和李斯之时,《诗》、《书》等更是

①此处文字的排序请参考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年,第 533 页。

遭到了彻底的禁止。庄子和法家反对经典的理由并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二者都把经典与先王联系起来，认为经典代表了先王的治国之道。而他们也都反对用先王之道来解决当时遇到的问题。庄子对此的表述是“礼义法度者，因时而变者也”，并把用古代的办法来对付当下的问题比做“推舟于陆”，详见《天运》篇。法家的表述则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即是说时代不同了，遇到的问题也不同，因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发生变化。

庄子和法家对经典的排斥与对先王之道的排斥是密不可分的。事实上，经典正被视为是先王之道的载体或者本身就是先王所作，这正是经典权威性的最后根源。《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晋国的贵族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于是发出如下的感慨：

> 周礼尽在鲁矣！吾于是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易》和《春秋》,作为后世经典的组成部分,韩宣子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周公的德行与周所以王天下的缘由。正可为上述说法提供一个佐证。从这个线索来看，在先秦诸子中，尊崇经典的儒家和墨家同时也是先王之道的维护者，是法古的模范，就更容易了解了。儒家和墨家甚至还为谁法的先王更古而发生争

论。墨家认为儒家只法周而不法夏，所以非古也。[①]

在《墨子》中，曾经讨论过判断一个主张正确与否的标准问题。墨家提出了三条标准，《非命上》说：

>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而第一条古者圣王之事，就记载在经典之中。所以我们看到墨家每每论及一项主张之时，总是引经据典，称述先王如何如何。我们且举一个例子。如《墨子·明鬼下》论证鬼的存在且明智时说：

> 今执无鬼者之言曰：先王之书，慎无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重有重之，亦何书之有哉？子墨子曰：《周书·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闻不已。”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且《周书》有鬼，而《商书》

① 详见《墨子·公孟篇》“子墨子曰……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

不鬼，则未足以为法也。然则姑尝上观乎《商书》，曰“呜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祸之时，百兽贞虫，允及飞鸟，莫不比方。翔佳人面，胡敢异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宁？”若能共允，住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宁者，以佐谋禹也。此吾所以知《商书》之鬼也。且《商书》独鬼，而《夏书》不鬼，则未足以为法也。然则姑尝上观乎《夏书》，《禹誓》曰：“大战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听誓于中军。曰：……是以赏于祖而戮于社。”赏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戮于社者何也？言听狱之事也。故古圣王必以鬼神为赏贤而罚暴，是故赏必于祖，而戮必于社。此吾所以知《夏书》之鬼也。故尚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语数鬼神之有也，重又重之，此其故何也？则圣王务之。以若书之说观之，则鬼神之有岂可疑哉？

墨家对明鬼之义的论证，不惜笔墨引用先王的言行作为证据，而先王的言行就见载于《诗》、《书》之中。而且从行文中不难看出，墨子认为，越古老的书籍，就越具权威性。

虽然墨家思想在主要的方面都与孔子和儒家对立，但若从墨子的学术渊源上论，他却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淮南子·要略》）。其引经据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论证方式也是承自于儒家的。与墨家相比，儒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的说法，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的做法则是一贯的。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论语》中多见其称颂尧舜和三代圣王的例子，以他们为理想政治的楷模。如称赞尧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论语·泰伯》）舜是“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禹是“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孟子也是如此，他最推崇的是“先王之道”，《离娄》篇说“不因先王之道者，可谓智乎？”所以《孟子》书中多见其称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的事迹。孔子和孟子对古代圣王的印象，当然与经典不能分开。如孟子与弟子讨论尧舜的故事，都出于《尚书》。因此，对先王的先王之道的推崇，表现在具体的论述中，就是常常引经典来说明要表达的思想。这是读者一望便知的。

对先王的推崇，若表现在历史观的方面，就是对古代社会和文化的肯定。孔子把历史文化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损益，而无实质性的变革。他在应答弟子子张的问题时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

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

王朝政权的更替和转移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变革，三代之礼的差别只限于一些具体的损益。由前视后，虽百世也是如此。这个想法，到汉代董仲舒的时候，就表述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举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至于三代的变化，只是“徙居处更称号”，改正塑，易服色（《春秋繁露·楚庄王》）等细节性的东西。这种对历史发展连续性的信任与强调，正是其相信经典价值的重要基础。

三、经典的解释

无论历史如何的连续，时间的差别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差别是谁也不能否认和忽视的。先王之道和经典毕竟是过去的东西，要想“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老子》），就必须把先王之道用当时的语言和观念表现出来。这就是经典解释的问题。如果说经典是经学的根底，那么经典的解释则是经学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经典需要解释是因为它必须面对新的环境和问题。它与当时的人们存在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因而也就存在着心灵的距离。通过解释可以消除这一距

离感，而使古老的经典在当下的现实中仍具足够的生命力。在神话研究中，学者们津津乐道于中国神话的历史化问题，而这种历史化就是通过解释来完成的。典型的例子是孔子对“夔一足”的解释，“夔”在神话中是个只有一条腿的神，所以说“一足”，但是孔子却利用汉语的歧义性，把“夔一足”理解为有夔一个人就足够了。（《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对于“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孔子来说，进行这样的解释是完全必要的。

经典解释的问题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讨论。一是解释的方法，二是解释的意义。解释的方法涉及到解释合理性的问题，而解释的意义则牵涉到解释目的的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可以从一个例子开始，《论语》有一段孔子和子夏读《诗》的记载，《八佾篇》说：

>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也？”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出自于《诗·卫风·硕人》。本来是对一个美丽女子的描述。“素以为绚兮”句今本《诗经》所无，孔子把它解释为素底上绘画，子夏又进一步从中看出礼后的问题。经过这样两层的解释，体会出的意义和《诗》本义之间的距离已经相当遥

远。但是这个距离正好可以填充我们上面提到的心灵距离。问题是：这种解释的合理性何在呢？

这就涉及到对经典本身性质的了解。为了使解释成为可能，必须有一个将经典意义普遍化的手段，使经典从本性上来说就具有多元解释的可能性，从而为后来的解释提供合理性的基础。儒家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给了很好的答案。还是以《诗》为例，《诗大序》说：

> 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毛诗正义》)

这六义之中,风雅颂讲诗的来源和作用,如‘风’是“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雅’是‘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而赋比兴则是讲诗的性质和体例。赋是直接铺陈,比是以此喻彼,兴是以此兴彼。其中比兴是最值得留意的。它不仅是做诗的方法，也是读诗的方法。依此种理解去读,则诗言草木就非草木,诗言爱情也非爱情,它们的意是在言外的。如《诗大序》在解释原本是情诗的《关雎》时,就说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孟子·告子上》解释‘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诗·大雅·既醉》),就说成是‘饱乎仁义

也”。而最明显的例子则见于马王堆和郭店的《五行篇》,[①] 这篇共引诗十余次，可以视为先秦儒家解诗的代表。我们举帛书中的一例：

> “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君子慎其独。”“[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

这里“尸鸠在桑”句出于《诗·曹风·尸鸠》，“[燕燕]于飞”句出于《邶风·燕燕》。《五行篇》对前者的解释是君子应“为一”和“慎独”，对后者的解释是“至哀”和“慎独”。经文和释文之间的距离是一望便知的。但其间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种联系更多是文字上的，如“一”等。要由此及彼，需要一个桥梁，《五行篇》称此桥梁为“目”“譬”“喻”。目通俾，是比的意思。譬和喻都有类似的意义，它解释喻说：

> 喻而知之，谓之[进之]，弗喻也，喻则知之[矣]知之则进耳。喻之也者，自所小好喻

① 马王堆《五行篇》释文请参看《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80年。郭店《五行篇》释文请参看《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

乎所大好。“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求之弗得,寤寐思服”,言其急也。“悠哉悠我，辗转反侧”，言其甚［急也］。如此其甚也，交诸父母之侧，为诸？则有死弗为之矣。交诸兄弟之侧，亦弗为也。［交诸］邦人之侧,亦弗为也。［畏］父兄，其杀畏人，礼也。由色喻于礼，进耳。

喻是由小好而喻大好。以下拿《关雎》之诗为例来说明。此诗本是表现男女爱情的诗，《五行》认为，读诗之时，应该由此表面的东西更进一步，进到礼的层次。就像是前引子夏和孔子读诗那样。

这就涉及到经典读法的问题。其实，解释的方法与读书的方法是一致的。对于同一个对象，如何去读，就决定了如何去解释。反之亦然。儒家之读经典，向来不主张做经典的奴隶，而是要求读者有自己的用心。如孟子的读诗，就要求“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义。以意逆志，是谓得之”(《孟子·万章上》)。意既是作者的用意，也是读者的用意，用心。这样读书，就可以超越表面，直接深入到经典的本质中去。另外，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一些近似于《易传》的作品，其中的《要》,曾经论到孔子读《易》的方法：

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